



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2014 年学术论文集]

丘进 张倩红 万明◎主编



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4年学术论文集

丘进 张倩红 万明◎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2014 年学术论文集 / 丘进, 张倩红, 万明主编.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13-5557-7

I. ①全… II. ①丘… ②张… ③万… III. ①中外关
系—国际关系史—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 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521 号

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2014 年学术论文集

主 编 / 丘 进 张倩红 万 明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高福庆 王 璐

装帧设计 / 贾惠茹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mm × 1020 mm 1/16 印张 / 30 字数 / 490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5557-7

定 价 / 6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200 周年与伯希和的贡献	耿 昇 (001)
评西方首部纳西学研究专著《麽些研究》	杨福泉 (035)
日本在华神社之研究	
——以杭州神社为例	陈小法 (043)
德国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	
——以《明镜周刊》为例	张绍铎 (058)
莫边府战役与日内瓦会议：从世界局势与中越关系视角的考察	
.....	于向东 (070)
中国历代的海路、海图及针经	陈佳荣 (082)
论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方 铁 (090)
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	张一平 (103)
试论丝绸之路上宗教传播流向及其成因	王 超 (117)
徐福为中日或东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施存龙 (131)
南唐章僚《海外使程广记》考	王元林 (153)
宋代大食进奉使辛押陀罗其人其事	
——兼谈广州蕃坊方位等问题	马建春 (169)
元明时期外国来华使臣驿站接待略述	
——以真定为中心的考察	戴建兵 邵 岩 (186)

郑和下西洋前后的满刺加社会	时 平 (195)
郑和军士本头公研究略陈	徐作生 (206)
论明永乐时期环渤海地区的海防	赵树国 (215)
晚明东亚海域地缘政治变迁与天津镇、登莱镇的建立	赵现海 (229)
佩里舰队所见琉球与中国、日本之关系	修 斌 刘啸虎 (246)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越友好	古小松 (266)
中文与阿拉伯文在印度洋的交流	
——以12-17世纪斯里兰卡地名的演变为中心	[意]胜 丽 (283)
中国藏李朝档案孤本《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新探	
.....	万 明 (307)
“学士”情结与中韩文化关系	
——以系列中国学士东迁案例为中心	刘永连 刘安祺 (329)
刘鸿训天启使行与朝鲜海上贡道之重启	
——兼及《辛酉皇华集》与《朝鲜光海君日记》叙事之比较	
.....	孙卫国 (345)
朝鲜使臣李民宬对明朝海交重镇登州的记述	王克平 (366)
从清代福建督抚奏疏看中西文化撞击	吴伯娅 (375)
“神豆汤”故事真相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张晓川 (390)

近代外资企业对巴蜀商业文化的影响	王雪梅 (401)
晚明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戚印平 (421)
略论 18-19 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冯立军 (429)
略论鸦片战争后福建外销茶贸易	张应龙 (448)
彰显全球化视野, 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	
——“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刘丽娟 彭 超 (460)
北京华文学院简介	(467)
北京华文学院: 赴华学习汉语首选	
——学华文, 知中国	(469)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200 周年与伯希和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耿 昇

摘 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创建于1814年，这是汉学首次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西方大学的圣殿。历经历史沧桑，今年正好是200周年，今年又是中法建交50周年，是个双喜的年份，在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200年历史上，共有9位教授执掌教席，四易其名，从来未曾间断过。该讲座不仅影响了欧洲以及整个域外的汉学研究，而且还促进了中西双方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有一个特殊的系列，即专门为自西域探险归来的伯希和设置的“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其教材就是来自伯希和西域探险中获得文献与文物，该讲座一共持续35年，它解读了西域多种已消逝的语言文字，复活已经湮灭的多种古文明，进一步理清了中国中原于西域间的历史渊源，促进了西域学诸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伯希和；西域

一、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今年是法兰西学院创设汉学讲座200周年，汉学由此堂而皇之地首次进入西方大学的神圣殿堂。今年又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双喜临门，值得我们隆重地庆祝与纪念中法交流史上的关键一年。

法兰西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享有有口皆碑的盛誉。它是法国历史上几位最早具有开放性视野和高度注重文化建设的文化政治强人，睿智决策与契而不舍努力的结果。它既完全符合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规律，盛世办教育；也符合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知识界向前所未知的事务开放，冲破基督宗教的长期羁绊，适应教育大改革的潮流。法兰西学院的雏形，应归功于 16 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学术的倡导者，并具有十足骑士风度的法兰西斯一世（François Ier, 1494—1547 年）国王。他在皇家文库主任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 1467—1540 年）的推动下，于 1530 年创建了“皇家六教授团”（Six Lecteurs royaux）。17 世纪时，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 年）国王号称“波旁王朝第一国王”，并在劳利公爵贝蒂纳的辅佐下，使法国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他制订了创立“皇家公学”的初步方案。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 年）国王号称“正义者路易”。他由首相黎舍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 1585—1642 年）枢机主教的匡扶，使法国成为欧洲最显赫的国家。他在 9 岁时便为“皇家公学”（皇家学院或“高卢皇家学院”）奠基。这就是沿革至今的法兰西学院的雏形。自该院于 1772 年对讲座教席位重新大分配之后，才逐渐形成了现今的法兰西学院的建制^①。

法兰西学院自草创伊始，便美名四溢。它的教育宗旨及其徽章上的格言，始终是“有教无类”（Vocation à tout enseigner）。

但直到 18 世纪末，法兰西学院的东方语言讲座，在古典语言文学方面，却只限于突厥语和波斯语、古叙利亚语与阿拉伯语，后来又增加了希伯来语。因为这几种语言都是东西方交流的中介语言、桥梁和工具。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和语言始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印度和中国的语言文学，尚未被纳入到该学院的教育大纲中。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政界仍有几位主张向东看的知华派人士。如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和法国重农派的代表人物杜果（Jacques Turgot, 1727—

^① 参阅《法兰西学院年鉴，1993—1994 年》（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1993—1994 年），1994 年法兰西学院版。

1781年)、国务部长贝尔坦(Henri Bertin, 1720—1792年)、法国传教士企业家和东印度公司驻交趾支那的代表彼埃尔·普瓦弗尔(Pierre Poivre, 1719—1786年), 法国黄经局局长、曾与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年)保持通讯关系并被誉为“法国牛顿”的天文史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年)等人。这些人都希望恢复或再现法国于17世纪—18世纪上半叶曾涌现出过的那种“中国热”的强劲势头。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活动, 才使中国语言文学的课程, 最终被纳入到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了。

在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和当时法国东方学界的领军人物希尔维斯特·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 1758—1838年)的多方游说和周密安排下, 在1814年才出版了自1776年起就陆续推出的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写作的《中国杂纂》第17卷。他利用这种有利的气氛以及他在东方学界的声望, 推动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 于1814年12月11日作出决定, 在该院开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座”(通称“汉学讲座”)。法兰西学院决定由年方27岁, 从未到过中国和非汉学科班出身的少帅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年)执掌教席。当时正值法国拿破仑第1次复辟期间, 也就是介于他1814年4月6日逊位与1815年3月1日自厄尔巴(Ilbe)复归之间, 也可以说该讲座是在法国动乱的政局中诞生的。经过积极筹划之后, 该讲座于1815年1月6日正式开讲。“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座”一直维持了104年, 直到沙畹于1918年逝世为止。此时满清王朝已经灭亡, “鞑靼—满语”已经不再有理由于该讲座中存在了。当马伯乐于1921年执掌该讲座的教席时, 便将该讲座易名为“汉语语言文学讲座”。此后, 该讲座的名称曾经经历过数次变迁, 但始终被称为“汉学讲席”。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是西方第一次使汉学登堂入室地进入文化金字塔的顶端大学。这是法国在西方汉学史上创造的多个“第一”之一。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 Louis IX, 1214—1270年)于1253年派遣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h, 约1215—1257年)出使元蒙帝国, 这在西方基督教列强国王中, 当属首次。鲁布鲁克的出使报告, 属西方最早有关中国国情诸方面的著作之列。1685

年，法国就派遣“六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入华，实际上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法国科学院”和“法国传教区”，而且他们在日后的法国汉学研究的兴趣中起了巨大作用。这种王家钦差的科学家传教士入华，亦属首例。仅就汉学被列入大学课程的历史来看，俄国于 1851 年，荷兰于 1875 年，英国于 1876 年和德国于 1912 年，才在大学里开设了汉学课程。1822 年，西方的第一个亚洲研究学会—法国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发行出版会刊《亚细亚学报》，一直延续至今。1890 年，法国与荷兰联袂创办西方第一份国际汉学期刊《通报》，一直持续至今。1920 年，由法中两国总统为最高赞助保护人，利用庚子赔款，法国成立了西方第一家汉学研究所（当时归属巴黎大学，现已划归法兰西学院）并陆续建成了西方最佳的汉学图书馆，出版发行高质量的《汉学研究所文库》和《汉学研究所丛刊》，一直延绵至今。1840 年，法国教育部组建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并于 1843 年开设汉语课程。它甚至仍早于西方其他大学汉语教学课程的开设。这些“第一”为中法文化交流，为法国汉学的兴起与发展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历史上，尤为可贵的是，无论世界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诸如动乱、战争、冷战，还是法国自己历史上的革命与复辟制度交替变化以及多次经济危机，也无论是中国政局的严重动荡和中法之间多次发生冲突与战争，该讲座却始终不受任何干扰，不仅顺利坚持下来了，而且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在法兰西学院讲座 200 年的历史上，共有 9 位世界顶级汉学家执掌教席。他们分别是雷慕沙（1788—1832 年，1814—1832 年执教）、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 年，1832—1873 年执教）、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 年，1874—1892 年执教）、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年，1893—1918 年执教）、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 年，1921—1945 年执教，他将该讲座易名为“汉语语言文学讲座”）、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 年，1946—1964 年执教。戴密微又与马伯乐形成了长达 40 多年由瑞士汝拉山区血统教授主持的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奇观）、石泰安（Rolf·A·Stein，1911—1999 年，1966—

1981年执教，该讲座又被易名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制度与观念”；这是该讲座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藏两种语言和文学的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 1973—1991年执教，他又将该讲座易名为“中国社会文化史”，他是考据派汉学与近代汉学之间的过渡人物）、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 1944—, 1991年开始执教，讲座的名称又改为“中国近代史”，他是率领法国汉学界走向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这九大教授，在200年期间，是法国汉学界世代薪尽火传的掌舵人。他们培养了许多名扬学界的汉学人才，组织撰写并出版了很多誉满书坛的汉学刊物和汉学名著，创建了多所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创新价值的汉学研究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汉学研究资料，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和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而不群的贡献。这一切对于中国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也是一种促进因素。中国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九大教授，基本上都涉及到了西域史的研究，包括西域历史、地理、考古、佛教、社会史和人类学史。这基本上形成了法国汉学的一大特征，也是法国汉学对中国西北边疆历史，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这更是法国汉学在整个西方汉学界绝无仅有的传统。如中国的典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沙畹，1894年）、《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儒莲，1853年）、《大唐西域记》（儒莲，1857—1858年）、《法显撰，佛国记》（雷慕沙，1836年）以及宋云、悟空、王玄策等人有关中国与西域关系的经典，都被法国汉学家们首先译作法文，使它们得以被西方学术界所熟识。其译注者正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主持人，如雷慕沙、沙畹和儒莲等。这批中国高僧大德们的游记和传记，堪称当时的一部部亚洲史。这些著作均为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著作。正是由于它们的法文译本在西方的流传，才促使普鲁斯奥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在他死后才出齐的5卷本《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年）中，结合个人的亲历考察记，最终于19世纪末叶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概念经过一段沉寂之后，是由法国汉学家们把它推到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法国学者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者，应为法国的“超级编书匠”格鲁塞

(René Grousset, 1885—1952 年)，他于 1942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①第 4 版中，加入了共 14 页的“丝绸之路”一章。“海上丝绸路”的概念，最早也是由沙畹大师提出来的。所以，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对于“丝绸之路”学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但法国对于丝绸之路、中西交通史和西域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的学者，还是应首推法兰西学院的另外两名教授和另一个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讲座主持人伯希和与韩百诗先生。

法兰西学院在上述“汉学讲座”系列之外，还曾设置过另外一个系列的两个有关中国西部地区的讲座。

伯希和本来就是沙畹大师的大弟子，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系列的传人，与该讲座永远有密切的关系。他于 1906—1908 年西域探险之后，携归了大批古文书、文物、文献和口碑资料。为了表彰伯希和西域探险的成功并诠释其所获丰富文献，法兰西学院于 1909 年，为伯希和专门开设了一个“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简称“西域史讲座”），它实际上于 1911 年正式开讲，并且一直持续到伯希和于 1945 年的逝世为止。这个共持续 35 年讲座的内容，都是伯希和从中国新疆和甘肃发掘到的文书和文物，涉及到了西域的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地理、文学、艺术诸多领域。伯希和是一位天才的史语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除了精通欧亚两大洲多种现代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古文字和西域死文字。其学问几乎涉及到了东方学的所有领域：汉学、伊朗学、蒙古学、突厥学、藏学、满族学、印度学、西域南海史地、基督宗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摩尼教、祆教和各种巫教。所以，他被人称为“超级东方学家”。他在法兰西学院主持的这个讲座，实际上利用他自西域携归的古文字文献和文物来诠释西域（特别是中国西部）的历史，它是雷慕沙讲座系列的一个重要支系。伯希和一生中的许多学术成果，也应归于该讲座。他讲述的许多内容，都属于“绝学”范畴，振兴和复活了许多已经湮灭的学科，也开拓了许多新学科，而且大都与中国西北史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吐火罗文（焉耆语和龟兹语）、佉卢文、于阗文、

^① René Grousset, L'Histoire de Chine, Faillar, Paris, 1942.

突厥文、回鹘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佛教的许多民间宗教的稀见经典。他有关西蒙古史的力作，虽然也均属此范畴，但略有小异。

伯希和在二战中忧国忧民，积劳成疾，于二战结束的当年便逝世了。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在二战期间，使法兰西学院丧失了两名汉学大师——伯希和与马伯乐。

伯希和逝世后，法兰西学院的这个“西域讲座”便停顿下来了。直到1963年，法兰西学院又为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设置了一个“西域历史文明”的讲座，以延续伯希和的学统。该讲座一直持续到韩百诗于1977年退休为止。其内容不仅涉及到西域史，还特别涉及到了蒙古史和南西伯利亚史。

二、伯希和的西域探险

在西方和日本争相向中国西部派遣考古探险团的热潮中，尤为注重文化事业的法国却姗姗来迟。在19世纪下半叶，只有几名法国旅行探险家进入过西域。如博楠（Charles Eudes Bonin，1865—1929）于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年）和李默德（Joseph Fernand Crenard）于1889—1894年、沙畹于1907年、古伯察（E·R·Huc，1813—1860）和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853）于1843—1845年，多伦（Henri d'Ollone，1868—1945）于1906—1907年、陪同奥尔良公爵的邦瓦洛（G·Bonvalot，1853—1933）于1895—1896年等，都曾先后赴西域不同地点旅行探险。虽然法国在西域考古探险起步较晚，人数较少，毕竟也获得了不少珍稀文物与文献。因为等到法国科考探险团远涉西域时，那里的几大重点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阗），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掠起精华而去了。

西方列强在西域科考探险方面的竞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他们为了在西域避免冲突，而从事更加系统而有条理的考察，决定分工对几大重点地区进行系统发掘，并且筹划统一协调该领域的工作。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初步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

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组建起来了。其总部便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别委员会。

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主席，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色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 年）先生，出身于豪门富户，终生酷爱学术。他年轻时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别是“北宗佛教”的诱惑，最终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学家。他曾出版过有关巴利文语法、印度文碑铭、印度种姓制度、《正法华经》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论著。他从 1882 年起便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士，同时又受聘为意、比、荷、俄、德诸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长达近 30 年，曾大力推动筹建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曾参与组织法国考察团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动，当时正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所以，正是他提议和推荐派遣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率团赴西域考察^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伯希和在 1906 年 7 月至 1908 年 10 月的西域探险期间，曾大量致信色纳尔，仅《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就发表了 31 封，而且全都是“学术书简”。所以，色纳尔先生不仅是推荐伯希和赴西域探险的“伯乐”，而且还是为他筹措经济赞助的幕前幕后的监护人，更是自始至终鼓励他的精神支柱，也是后期伯希和科研成果发表的推动者。没有色纳尔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伯希和西域探险就成败难测了^②。

伯希和率领的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它首先是根据西域考察国际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与其他国家的国别委员会充分协商之后，才组织起来并划定了活动地盘。法方又将此事通知了中国政府，以便办理签证，并要求中国各地方当局给予协助。法国资助伯希和西域科考探险团的是法国外交部、教育部、科学院、地理学会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法国的奥尔良公爵和罗兰·波拿巴王子也都亲自出面

① Paul Pelliot, 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Paris, Musée Guimet, 2008.

② 见伯希和为色纳尔先生所写的仆告，Paul Pelliot, Nécrologie, Emile Senart, 1847-1928,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5, 1928, p6-8.

赞助。在伯希和一行回国后，于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大学阶梯教室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法国内阁的多位阁僚以及赞助单位的头面人物莅临恭贺。名星巨擘济济一堂，美誉之辞不绝于口，充满着对未来科研的憧憬。这些都证明了伯希和探险团的官方或半官方特征。

对于这一切，伯希和于其《西域探险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述。如他于1907年4月12日致色纳尔的信中就写道：“我通过我的兄弟而得以获知，罗兰王子已经支付了他许诺的赞助款。您在国民教育部的干预，又使我们获得了一笔5000法郎的补充津贴。这一切太好了。但科学院尚未行动，如果加尔尼埃（Garnier）基金的经费允许的话，那么它也准备再次帮助我们。对于转到我们手中的所有资金，我们始终都试图作最佳使用。这是因为我看到了您的活动范围该是多么广阔啊！我感谢您为我们而敲开了所有的大门”^①。“我还感谢您在文化部，罗兰·波拿巴（Roland Bonaparte）王子处，利用一切机会奔走，为我们所付出的辛苦”^②。

在中国人一方，也按照与法国外交部的协议，而给予伯希和一行必要的帮助。伯希和每到一处，总要去拜访当地最高官员，中国官员也去回访他。他们每到一个重要地点，中国官府也总会提前作安排。当他与民工或当地人士发生纠纷时，中国官府也负责调解；在遇到诉讼时，中方也负责审理。伯希和自己就曾讲过^③：“我们必须经过安班（ambol，参赞大臣）处。大雨助人，我们一直在策划让他友好地招待我们直到明天”。

“安班（昂邦）王大人（Wang Ta-jen）是一位江南人。他对于听到一位用其母语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似乎并不感到惊奇。这就相当于对我们的一种友好接待。后来，当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是谁时，其师爷便于档案中寻找，并且带回了与我们有关的一份官方通知。其中提到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色纳尔、学者伯希和、瓦阳博士以及一位摄影士将前往旅行

① Paul Pelliot, *Carnet de Route*, 1906-1908, p384.

② *ibid*, p381.

③ *ibid*, p42.

等，应该给予他们帮助和保护，一切均按由吕公使（Dubail）^①致大清国外务部照会的意见去办”。

伯希和时任设立于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他从很年轻时代起，就是一名崭露头角的优秀东方学家。他是当时法国少有的“知华派”教授，也是法国大学讲堂上的中国文明的宣教师。他在 22 岁时，于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工作，恰逢义和团围攻外国驻京使领馆的骚乱。他竟然不顾排外情绪亢奋的义和团团民的围攻，赤手空拳地跑到大街上与团民搏斗，而且还夺取一面义和团团旗，至今仍收藏在巴黎荣军院（残老军人院，Invalides），这就充分表现了伯希和的一种争强好胜的精神。伯希和于 1899 年赴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当他 1906 年受命率西域科考探险团出发时，他不但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汉学教授了，而且还有望竞选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职位。但他放弃了这一切名利，而全心全意地去投身并主持一次其前途未卜、成败难定和艰苦卓绝的西域科考探险事业中了。这不能不说明他是一名很有头脑、很有理想、很有魄力和很有为科学献身精神的人物。

西域探险需要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诸语言（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蒙古语（特别是卡尔梅克蒙古语和硕特蒙古语）、梵语和其他的印度语言、阿拉伯—波斯语、俄语，甚至还包括印支半岛上的某些语言。对于如此之多的语言，伯希和有时是在途中边走边学习或边进修的。伯希和本人实在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几乎精通中亚和东亚的所有语言。他的汉语文化知识也较当时西方赴西域探险的其他人要精深得多。我们从敦煌千佛洞“取捨文书”过程中便可以窥见其一斑。斯坦因作为一名资深的考古学家，对于汉文和有关历史知识却远远不足。他先于伯希和到达敦煌千佛洞，首先挑选的都是些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这从考古学观点上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批文书大都为当地僧俗二众作为功德而供养的佛经写卷。伯希和挑拣的许多文书，却是双面都有文字和初看起来“破烂不堪”的卷子。其实，

① 指法国驻华公使吕班（Pierre Dubail，1845—1932 年）分别于 1898 和 1906 年两度出任驻华公使，此前还曾于 1893—1896 年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它们都是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书、小部佛典俗文学文书）和史地文书。伯希和对于有关的中国历史典籍的熟悉程度，连当时中国的大文豪们，也都叹为观止，刮目相看，如王国维、罗振玉和沈增植等人。

伯希和一行是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的。直到1908年9月底，他又从郑州乘火车赴北京，共历时两年零3个多月。伯希和于10月间到达北京；于12月12日到达河内，一直停留到1909年5月；然后又经过北京，停留4个月，于1909年10月从北京出发返回巴黎。包括伯希和在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滞留，以及等待其行李文物运抵法国的时间在内，他们共用了近3个月的光阴。直到1909年12月10日，法国各界在巴黎大学阶梯大教室举行欢迎大会，才使这次西域探险落下了大幕，史称“伯希和西域探险3年”。

伯希和西域科考探险团在我国西域地区的活动，主要分成了四大块。他们从1906年6月15日从巴黎出发，于该年8月间，开始进入中国境内。他们首先在喀什地区，主要是在莫尔佛教遗址、三仙洞、特别是在图木舒克作考察和发掘。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图木舒克，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绿洲。他们在库车地区停留近8个月，其重点目标是苏巴什佛寺大遗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和克孜尔千佛洞。尽管该地区已经被俄德日等国科考探险家们仔细发掘和筛选过了。伯希和探险团仍在这里有重大收获，并由此而形成了在库车地区的一系列考古报告，诸如《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1982年，文字版和图版版）^①、《图木舒克》（1961年版，文字版与图版版）^②。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9月3日离开库车赴乌鲁木齐，然后又到达吐鲁番地区。但由于德国人已经在吐鲁番大举发掘过，致使法国人收获不大，主要是对吐鲁番的交通路线作了考察。伯希和对吐鲁番地区的考察，导致他后

① Madeleine Hallade, Simone Gautier, Douldour-Âquour et Soubachi, planches, 1967, Adrien Maisonneuve, Textes, Collège de France, 1982.

② Toumchouq, textes, sous la direction de Louis Hambis, 1961; planches, 1964.